

本科毕业生的英语能力对毕业去向的影响研究

——基于202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的实证分析

阮倩, 岳昌君, 闫思宇

[摘要]在多语种并举的教育转型中,公共英语教育面临价值重估与提质增效的双重需求;而提升就业胜任力以增强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适配度,是当前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改革导向。本文基于202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数据,从毕业去向的角度探究本科生的英语能力对其继续深造和落实就业的影响及异质效应。研究发现,英语能力能够显著促进本科生落实毕业去向,并影响其去向选择。持有大学英语四级证书或四级成绩更高者更倾向继续深造,灵活就业的可能性更低,更易处于“慢就业”;口语水平更高者则更倾向单位就业,灵活就业的可能性更高,降低了“慢就业”的概率。在促进单位就业方面,四级证书的信号作用减弱,但四级成绩和口语水平的正向影响显著。同时,出色的英语能力更有利于提升女性和人文社科专业本科生落实就业的概率,有助于缩小就业中的性别与学科差异,促进就业机会公平。研究表明,公共英语教育对服务大学生长期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但需加快从“应试”向“应用”教学模式的转变;大学生也需结合自身发展需求优化英语学习行为,并策略性发挥英语优势以更好地服务就业与发展。

[关键词]本科毕业生;英语能力;毕业去向;公共英语教育

一、引言

在我国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驱动下,高

[收稿日期] 2025-03-1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的评价与对策研究”(22JJD880038)。

[作者简介] 阮倩,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涉外警务学院,电子邮箱地址: ivysmiletolfie@163.com;岳昌君,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电子邮箱地址: cjyue@pku.edu.cn;闫思宇(通讯作者),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电子邮箱地址: yansiyu3955@stu.pku.edu.cn。

校公共外语教育正逐步从以英语为主的单一模式向多语种并举的多元化模式转型。英语作为第一外语的绝对优势有所削弱,公共英语教育面临着价值重估的外在挑战和提质增效的内在需求。作为对外界质疑和改革需求的回应,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2020 年发布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提出,公共英语教育应以满足多元主体(包括国家、社会、学校和个人)需求为导向、实施“校本特色”的改革策略。其中,满足学生继续深造和工作就业的需求既是其改革的重要导向,更是其存续的价值所在。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高校毕业生作为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保就业稳就业的重点群体(邱文琪和岳昌君,2024)。《教育部关于做好 2024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提出,“各地各高校要建立完善就业与招生、培养联动的有效机制,把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作为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①,以此来应对当前的就业挑战。这一政策旨在提升高校人才培养与 market 需求的适配度,反映出大学生就业胜任力的提升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导向。在此背景下,从是否有助于毕业生充分落实毕业去向的角度来评估公共英语教育的价值,并探索其提质增效的对策,对于优化高校外语教育、调整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以及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鉴于此,本文将聚焦公共英语教育过程中本科生的英语能力在其落实毕业去向层面的贡献。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和信号理论的综合视角,采用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数据,分析不同维度的英语能力对本科生毕业去向落实率、升学率及就业率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对不同性别及学科门类的毕业生影响的异质效应。本文既是对公共英语教育价值的科学评估与提质增效的对策探索,也能为本科生优化英语学习并策略性地发挥英语优势、落实毕业去向提供指导与参考。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英语能力的界定及测量

英语能力是说者—听者内在语法的语言规则与交际策略在大脑中的体现(Chomsky, 1965),即言语者对语言规则和应用技能的内化与积累。而产出行为被看作一扇窗户,透过这扇窗户可以观察到学习者内化了的规则系统(埃

^① 《教育部关于做好 2024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12/content_6918529.htm。

利斯, 2020)。因此, 关于英语能力的研究聚焦于学习者如何将内在的语言规则与运用潜质有效外化, 具体表现为听、说、读、写等语言技能及其综合运用能力(Gardner, 1983)。

基于上述界定, 人们通常通过分项或综合性的英语考试对英语能力进行测量。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CET-4、CET-6)是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针对本科公共英语课程自主研发的考试项目, 其设计契合课程对学生英语综合能力的要求(金艳和杨惠中, 2018)。作为高校公共英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语言测试项目已成为本科生的全国性统一考试, 其成绩在反映我国公共英语教学成效方面比 TOEFL、IELTS 等国际或地区性英语考试更具针对性。同时, 作为中国大学生英语能力的代理变量, 其有效性已获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可, 被认为比高考成绩或 GRE 更具代表性(Guo and Sun, 2014; 霍灵光和陈媛媛, 2017)。由于只有通过四级考试的学生才能报考六级, 而大部分接受公共英语教育的学生都参加了四级考试, 因此四级成绩在反映全体本科生英语水平上更具代表性。鉴于此, 本文主要采用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来反映本科毕业生英语能力水平。

(二)英语能力的劳动力市场回报相关研究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核心命题推动了国外学界语言经济学研究的蓬勃发展。加拿大等北美移民国家率先对语言与收入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随后, 这类研究开始在瑞士、英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兴起, 并于 21 世纪初扩展至土耳其、印度、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大量研究表明, 目的国语言技能(主要是英语)对移民的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 但不同语言技能的影响存在差异(Breton, 1964; Chiswick, 1978, 1991; McManus et al., 1983); 在官方语言为非英语的国家中, 英语也普遍存在“收入溢价”现象, 且对女性的影响更明显(Di Paolo and Tansel, 2019)。然而, 国外学界对英语能力的非货币收益探讨相对不足。

我国学者于 20 世纪末开始关注外语教育的经济价值(许其潮, 1999; 张忻, 2008; 江桂英, 2010), 但初期研究多依赖理论推演。2010 年以来, 随着国家外语能力建设与国家战略的紧密对接, 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议题, 基于微观数据对英语能力的工资效应展开实证研究。已有研究大多依托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或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等调查数据, 关注英语综合能力和分项技能对收入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刘国辉, 2013; Wang et al., 2017; 高原, 2017; 霍灵光和陈媛媛, 2017)。这些研究在数据来源上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但对英语能力的度量多依赖于自我评价, 相较而言, 利用他人评价或客观测量的方法效果更好

(Akresh and Frank, 2011)。

现有针对高校毕业生的研究主要以英语四、六级证书或考试成绩作为英语能力的代理变量,有效减少了主观评价带来的结果偏误。在研究内容上,学者们开始关注英语能力对非货币收益(如工作搜寻成本、面试成功率、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岳昌君,2013;董占奎,2014;潘昆峰和崔盛,2016;熊毅,2016;刘蓝惠和周蕾,2018;刘凌宇等,2018;周丽萍和蒋承,2020;贾巍巍,2021)。然而,围绕英语能力对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的落实情况 and 选择方向的已有研究仍然较少,部分研究仅采用小范围的调查数据,数据代表性不足,不利于研究结果的推广。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外语教育所形成的外语知识与技能是生产性的人力资本要素,能为投资者带来经济收益(Chiswick and Miller, 1995; 张卫国, 2008)。根据信号理论,外语证书或考试成绩可以传递学习者的外语能力“信号”,通过筛选功能的发挥,为持有者带来回报(Spence, 1973; 贺尊, 2006)。基于上述理论,并参考有关英语能力的经济价值和非货币收益的相关文献,本文认为,英语能力对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情况(包括落实就业和继续深造)同样有着促进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

假设 H1: 本科生的英语能力对毕业去向的落实率(包括落实就业和继续深造)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英语能力的劳动力市场回报异质性研究

英语能力对不同群体收入的影响也是国内外语言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国外研究发现,英语熟练度较高能够显著降低由移民身份或种族差异带来的收入惩罚效应(Tong et al., 2022)。与国外不同,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收入差距主要体现为性别、户籍与教育背景的结构性偏好。已有研究表明,英语能力对高学历群体、城镇户籍劳动者及东部地区从业者的工资溢价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从而强化了以上特征群体的收入优势(Wang et al., 2017; 高原, 2017; 霍灵光和陈媛媛, 2017)。也有学者从性别、学科专业或院校类型层面分析英语能力对大学毕业生收入及其他就业表现影响的异质效应(熊毅, 2016; 贾巍巍, 2021)。

高校毕业生在落实毕业去向时所呈现的性别差异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研究表明,我国男性毕业生的毕业落实率为 74.8%,女性毕业生为 64.8%,这主要是因为男性毕业生在单位就业和灵活就业层面的落实率均高于女性(邱文琪等, 2024)。与此同时, Svantesson(2006)发现英语听说能力的影响有着性别差异,其对女性的劳动参与存在显著影响。谭远发等(2017)认为,“聋哑英语”对男性的职场表现有着更明显的负向影响,会降低男性在国企就业的比例

和工资水平。另有大量研究表明,语言学习中男女有别,不论是大脑加工机制的不同还是学习策略上的差异,女性在母语和外语的习得层面都展示出了语言优势(陈琳,2014)。由此可以推测,英语能力方面的优势可能对女性毕业生就业有着积极意义。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2。

假设 H2:英语能力的影响具有性别差异。在女性群体中,本科生的英语能力对毕业去向的落实率有着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

此外,高校毕业生就业时的学科背景差异同样明显。从学科门类来看,相比于理工科专业毕业生,人文社科专业毕业生的毕业落实率并不占优(邱文琪等,2024)。但是考虑到人文社科专业的研究对象多为文本文献和社会现象,学习过程涉及大量阅读、写作和批判性分析,且课堂讨论等形式的教学方式给人文社科专业本科生提供了更多口语练习和表达的机会,因此,在英语能力层面,人文社科专业的本科生可能比理工科专业的本科生更具优势。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3。

假设 H3:英语能力的影响具有学科差异。在人文社科专业中,本科生的英语能力对毕业去向的落实率有着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

本文的独特价值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落实毕业去向是高校毕业生走向社会的初始环节,其明确性与方向性直接关系到毕业生发展的初始表现。本文专门探讨英语能力对该方面的影响,是对现有研究视角的有益补充。其次,本文采用考试成绩、口语水平及能力证书等多维语言能力指标,能更全面、准确地反映毕业生真实的英语水平并评估其实际回报。再次,本文采用全国范围较新年度的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数据在信效度、代表性和时效性等方面的优势,为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可靠性和推广性提供了有力支持。最后,针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因性别与学科偏好导致的结构性就业不平等,本文检验了英语能力对弱势毕业生的补偿效应,并从促进就业公平角度提出了差异化的赋能路径,从而提升了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与指导价值。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Chinese College Graduates Employment Survey, CCGES)课题组于2023年进行的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自2003年6月起,课题组每隔一年对全国高校毕业生进行一次问卷调查,至2023年6月,已实施了11次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形成了长期且系统的数据积累。2023年的调查涉及

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共计 22 个省份 45 所高校。每所高校根据毕业生的学历和学科结构按一定比例发放 500—1000 份问卷,调查最终共收回有效问卷 27334 份。考虑到不同学历层次公共英语教育方法和模式存在差异,本文主要关注英语能力对本科生毕业去向的影响。同时,为了准确识别上述效应,本文进一步剔除了英语专业或英语交叉专业的样本,最终确定有效观测数为 11254 个。

(二)变量选取

1. 因变量

本文从明确性和方向性两个维度描述本科生的毕业去向落实情况。在明确性方面,将已确定单位、国内升学、出国/出境、自由职业、自主创业及其他灵活就业的毕业生归为“已落实毕业去向”,将待就业、不就业拟升学、其他暂不就业及其他去向的毕业生归为“未落实毕业去向”,构建一个反映毕业去向是否明确落实的二分变量。在方向性方面,将毕业去向分为单位就业,继续深造(包括国内升学、出国/出境),灵活就业(包括自由职业、自主创业、其他灵活就业)和未落实四类,构建一个反映毕业去向具体类型的多分类变量。

2. 自变量

本文从语言基础、能力证书和语用能力等维度来度量毕业生的英语能力,构建了三个核心自变量:四级笔试成绩、是否持有四级证书和英语口语水平。

首先,本文采用四级笔试成绩来度量毕业生的英语基础。其次,鉴于 425 分通常被视为四级笔试考试的及格线,本文将成绩在 425 分以上的毕业生归为“有证”,其余归为“无证”,构建一个二分变量,以反映毕业生“是否持有英语四级证书”。最后,本文以“英语口语水平”作为毕业生语用能力的代理变量。尽管英语四级考试包含口语考试,但其并非必考项目,通常只有具备一定口语能力的学生才会主动报名参加,由此获得的口语成绩存在一定自选择偏差。鉴于此,本文依托调查问卷中的口语水平自评数据构建该指标。问卷中,学生需在“非常好、比较好、一般、比较差和非常差”五级选项中进行选择。由于人们倾向于高估自身语言能力,为降低衡量偏误,本文参考既有文献的处理方法(高原,2017;刘国辉和张卫国,2015),将五级评价整合为“差”(包括非常差、比较差)、“一般”和“流利”(包括比较好、非常好)三个层级,构建一个定序变量,以更准确地反映毕业生的语言交流能力。

英语四级证书和四级笔试成绩作为语言资本的量化指标,总体评估了学习者在英语基础知识和应试技能上的外化能力,同时也是就业市场中具有筛

选效应的能力信号。英语口语水平则可以衡量学习者在真实交流场景中能否流利、准确地使用英语进行有效沟通、建立联系，反映出学习者在跨文化交流、人际互动，以及高效融入等方面的潜质，是语言资本在实际应用中的重要体现。

3. 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毕业生基本特征、家庭背景、人力资本和学校特征四个方面。具体变量定义与说明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与说明

变量类型	因素	具体变量	说明
因变量	毕业去向	是否落实毕业去向	已落实，未落实(对照组)
		毕业去向类型	单位就业，继续深造，灵活就业，未落实(对照组)
自变量	英语能力	英语四级证书	有证，无证(对照组)
		四级笔试成绩	连续变量；单位：分
		英语口语水平	流利，一般，差(对照组)
控制变量	基本特征	性别	男，女(对照组)
		民族	汉族，少数民族(对照组)
	家庭背景	家庭所在地	城市，非城市(对照组，包括县镇、农村)
		家庭人均年收入	10 万元及以上，5—10 万元，1—5 万元，1 万元及以下(对照组)
		父母受教育年限	连续变量；根据父母受教育程度推算，取父亲与母亲受教育年限最大值
		父母职业	父母至少一方为管理技术人员，父母均非管理技术人员(对照组)
	人力资本	学习成绩	前 25%，中上 25%，后 50%(对照组)
		奖学金	获得过，未获得过(对照组)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非中共党员(对照组)
		实习经历	有，没有(对照组)
		境外交流经历	有，没有(对照组)
		辅修/双学位	有，没有(对照组)
		学生干部	担任过，未担任过(对照组)

续表

变量类型	因素	具体变量	说明
控制变量	人力资本	学科门类	人文(包括哲学、文学、历史学、艺术学), 社科(对照组, 包括法学、教育学), 经济管理, 理工科, 其他(包括农学、医学、交叉学科)
		学校所在地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对照组)
	学校特征	学校类型	“双一流”高校, 非“双一流”高校(对照组)

(三)研究方法

根据毕业去向明确性与方向性指标的不同设定, 本文运用多种计量回归方法。首先, 本文构建如公式(1)所示的二元逻辑斯特回归(Logit)模型, 分析英语能力在毕业去向明确性上的总体影响。

$$Logit(P)=\ln\left(\frac{P}{1-P}\right)=\beta_0+\beta_1English_i+\sum\beta_kZ_{ik}+\epsilon_i$$

(1)

式中, P 为“已落实”的概率, $1-P$ 为“未落实”的概率, $P/(1-P)$ 为已落实的概率与未落实的优势比(Odds Ratio), 定义为落实毕业去向的机会比率。自变量 $English_i$ 为毕业生 i 的英语能力, Z_{ik} 表示系列控制变量, 包括基本特征、家庭背景、人力资本、学校特征(下同)。

其次, 本文构建如公式(2)所示的多元逻辑斯特回归(M-Logit)模型, 分析英语能力在毕业去向方向性上的总体影响。

$$Logit(P_{j/1})=\ln\left(\frac{P(choice_i=j)}{P(choice_i=1)}\right)=\beta_0+\beta_{1j}English_i+\sum\beta_{jk}Z_{ik}+\epsilon_{ij}$$

(2)

式中, 因变量 $choice_i$ 为毕业去向的具体类型, 包括“单位就业”“继续深造”“灵活就业”“未落实”, 以 $j=1$ (未落实)作为对照组; 自变量 $English_i$ 为毕业生 i 的英语能力, Z_{ik} 为系列控制变量。

最后, 在探讨英语能力影响的异质效应时, 本文在二元逻辑斯特回归模型与多元逻辑斯特回归模型中分别加入核心自变量英语能力与性别或学科大类的交互项。具体模型构建如公式(3)、(4)所示。

$$Logit(P)=\ln\left(\frac{P}{1-P}\right)=\beta_0+\beta_1English_i+\gamma M_i$$

$$+\delta English_i\times M_i+\sum\beta_kZ_{ik}+\epsilon_i$$

(3)

$$\begin{aligned} \text{Logit}(P_{j/1}) = \ln\left(\frac{P(\text{choice}_i = j)}{P(\text{choice}_i = 1)}\right) = & \beta_0 + \beta_{1j} \text{English}_i + \gamma_j M_i \\ & + \delta_j \text{English}_i \times M_i + \sum \beta_{jk} Z_{ik} + \epsilon_{ij} \end{aligned}$$

(4)

式中， M_i 分别代表性别或学科大类，前者分为男性与女性，后者分为人文社科、经济管理、理工农医三类； $\text{English}_i \times M_i$ 为英语能力与性别或学科大类的交互项；控制变量 Z_{ik} 均与排除性别或学科类别的公式(1)、(2)中的控制变量保持一致。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本科生的毕业去向

表 2 是对样本中 2023 届本科毕业生去向总体情况的描述统计。如表 2 所示，继续深造的毕业生最多，占比为 33.5%，尤以国内升学为主，占比达 30.3%。未落实的占比为 32.9%，其中待就业、不就业拟升学、其他(包括其他暂不就业、其他)的占比分别为 20.9%、5.6%、6.4%。单位就业的占比为 29.3%。灵活就业的占比最低，为 4.3%，其中，自由职业、自主创业、其他灵活就业的占比分别为 1.5%、0.5%、2.3%。由此统计，样本中 2023 届本科毕业生毕业去向的落实率为 67.1%，“慢就业”^①现象凸显(岳昌君，2023)。

表 2 2023 届本科毕业生的毕业去向情况

已落实	频数(人)	频率(%)	未落实	频数(人)	频率(%)
单位就业	3298	29.3	待就业	2351	20.9
灵活就业	486	4.3	不就业拟升学	632	5.6
自由职业	169	1.5	其他暂不就业	528	4.7
自主创业	61	0.5	其他	187	1.7
其他灵活就业	256	2.3			
继续深造	3772	33.5			

① 狭义“慢就业”指未就业且未继续深造的毕业生，即“其他暂不就业”和“其他”两类未落实去向的毕业生。他们有些对就业机会犹豫未决而被动成为“慢就业”者，有些是主动选择暂不就业或升学，待深入了解社会后，再择机就业或升学。据 CCGES 数据统计，此两类毕业生的比例自 2015 年以来呈现上升的趋势，2015 年、2017 年、2019 年和 2021 年的比例分别为 2.0%、2.3%、3.7% 和 4.1%。广义“慢就业”还涵盖未就业拟升学的毕业生。

续表					
已落实	频数(人)	频率(%)	未落实	频数(人)	频率(%)
升学(国内)	3415	30.3			
出国、出境	357	3.2			
合计	7556	67.1		3698	32.9

(二)英语能力对毕业去向的总体影响

表 3 展示了英语能力对本科生毕业去向总体影响的回归结果。第(1)列为三项指标影响毕业去向明确性的二元逻辑斯特回归分析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三项指标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对明确毕业去向存在正向影响。具体而言,有证、成绩越高或口语流利的毕业生,均更可能明确毕业去向,未落实的概率显著更低。

第(2)一(4)列和第(5)一(7)列的多元逻辑斯特回归分别以未落实毕业去向和已落实单位就业为对照组,进一步展示了三项指标对毕业去向选择的影响及差异。第(2)一(3)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以未落实为对照组,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四级证书和笔试成绩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对落实继续深造存在正向影响。具体而言,有证、成绩越高的毕业生,均更可能落实继续深造,未落实的概率显著更低。然而,口语水平对落实继续深造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当前无论是国内升学还是跨境留学,外语技能考试均为人才筛选的必要环节;这种选拔机制更侧重对语言基础知识的考查,口语能力的权重相对较低。因此,证书的获取和出色的笔试成绩在成功落实继续深造上更具决定性作用。

在落实单位就业层面,笔试成绩和口语水平分别在 1%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正向影响,且口语水平的影响系数随能力水平的提升而增大。这表明四级成绩和口语水平越高的毕业生均更容易落实单位就业,未落实的概率显著更低。然而,四级证书对落实这一去向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随着我国大学生英语能力的整体提升,当 80% 以上的毕业生能够达到英语四级证书的标准时,^① 证书如同“货币”一样出现了“通货膨胀”,贬值成为一种弱信号,对高能力和普通能力者的甄别不再灵敏(周丽萍和蒋承, 2020)。以上结果支持了假设 H1。

① 据 CCGES 数据统计,2015 年、2017 年、2019 年、2021 年本科毕业生中持有英语四级证书(四级笔试成绩达 425 分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 80.5%、83.1%、83.3%、85.2%,呈稳步增长趋势。虽然 2023 年的有证毕业生比例下滑至 80.1%,但仍保持着 80% 以上的通过率。

第(5)列的回归结果显示,相比于单位就业的毕业生,有证书和成绩越高的毕业生则均更可能继续深造,统计显著性为 1%;而口语水平越高的毕业生则更可能落实单位就业,统计显著性为 10%。这一结果反映了不同去向的人才选拔机制对本科生毕业选择的影响。如前文所述,在落实继续深造上,“能考”比“能说”更具竞争优势,因此,英语基础知识和应试技能强的毕业生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更倾向继续深造。相较而言,劳动力市场的人才甄别机制更为多元,也更加注重知识技能的实际应用与转化能力。因此,作为英语应用能力的重要指标,出色的交流能力使技能拥有者更易获得优质的就业岗位,从而顺利落实就业。

在促进灵活就业层面,第(4)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以未落实为对照组,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口语流利的正向影响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但四级证书和笔试成绩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负向影响。这表明口语流利的毕业生比口语差的毕业生更容易通过灵活就业落实毕业去向,显著降低了未落实的概率,然而有证和成绩越高的毕业生,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均更低,从而显著提升了未落实的概率。同时,根据第(6)列的回归结果,对比单位就业和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有证和成绩越高的毕业生均更倾向单位就业,统计显著性达 1%。

上述结果表明,在促进就业落实方面,毕业生的英语交流能力相较于英语基础知识和应试技能,发挥了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上述结果也反映了就业观念对毕业生去向选择的重要影响。基于我国劳动力市场阶梯型多元分割的特点,叠加近年来经济增速放缓和市场就业不稳定性增加等原因,求职大学生尤其看重“职业发展前景”“福利待遇”和“工作稳定性”(岳昌君, 2012; 岳昌君, 2023);他们更中意由正规单位提供的工作机会。在此背景下,有证或成绩出色的毕业生在竞争此类岗位时更具优势。若就业不理想,他们更倾向“不就业拟升学”或“暂不就业”,而非通过自主创业或自由职业等灵活就业形式来寻求出路。这就导致了当下大学生就业中“有业不就”与“无业可就”并存的局面,催生了“慢就业”现象。

表 3 英语能力对毕业去向总体影响的估计结果

	已落实	单位就业	继续深造	灵活就业	继续深造	灵活就业	未落实
		以未落实毕业去向为对照组			以已落实单位就业为对照组		
	(1)	(2)	(3)	(4)	(5)	(6)	(7)
英语四级证书(基准组：无证)							
有证	0.378*** (0.056)	0.077 (0.062)	1.463*** (0.091)	-0.401*** (0.111)	1.385*** (0.091)	-0.478*** (0.113)	-0.077 (0.062)

续表							
	已落实	单位就业	继续深造	灵活就业	继续深造	灵活就业	未落实
		以未落实毕业去向为对照组			以已落实单位就业为对照组		
	(1)	(2)	(3)	(4)	(5)	(6)	(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数	11254	11254	11254	11254	11254	11254	11254
Pseudo R ²	0.095	0.124	0.124	0.124	0.124	0.124	0.124
四级笔试成绩	0.005*** (0.000)	0.002*** (0.000)	0.011*** (0.000)	-0.003*** (0.001)	0.009*** (0.000)	-0.005*** (0.001)	-0.002*** (0.00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数	11254	11254	11254	11254	11254	11254	11254
Pseudo R ²	0.104	0.136	0.136	0.136	0.136	0.136	0.136
英语口语水平(基准组:差)							
一般	0.063 (0.052)	0.139* (0.060)	-0.051 (0.064)	0.224 (0.122)	-0.189** (0.065)	0.086 (0.124)	-0.139* (0.060)
流利	0.266*** (0.069)	0.359*** (0.079)	0.155 (0.083)	0.326* (0.158)	-0.205* (0.080)	-0.034 (0.159)	-0.359*** (0.07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数	11254	11254	11254	11254	11254	11254	11254
Pseudo R ²	0.093	0.112	0.112	0.112	0.112	0.112	0.112

注：***p<0.01，**p<0.05，* p<0.1；估计系数下方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第(1)列为 Logit 回归；第(2)－(4)列为以未落实毕业去向为对照组的 M-Logit 回归；第(5)－(7)列为以已落实单位就业为对照组的 M-Logit 回归；控制变量包括本科毕业生的基本特征、家庭背景、人力资本、学校特征。后表同。

(三)英语能力对毕业去向影响的异质效应

本文进一步考察不同性别毕业生的英语能力对毕业去向影响的异质效应，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第(1)列和第(2)－(4)列分别报告了三项指标对毕业去向的明确性和方向性影响的性别差异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与男性相比，在明确毕业去向和落实单位就业层面，有证、成绩越高和口语流利均对女性的落实率提升作用更大；在落实继续深造层面，成绩越高和口语流利均对女性的落实率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以上结果支持了假设 H2。

与此同时，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可能因其出色的英语能力而落实就业单位、明确毕业去向。这一影响差异可以从就业市场需求角度进行解释。在教

育、医疗、服务业等众多工作场景中，良好的沟通协作能力至关重要。女性通常被认为更加细心且更具耐心和亲和力，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人、表达自我并协调各方。因此，相较于男性，持有外语能力凭证或交流能力出色的女性毕业生更容易获得招聘者对其职业胜任力的认可而获得就业机会。

此外，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可能因其出色的四级成绩或口语能力而成功实现继续深造。这一差异是学历证书的信号作用与就业市场的性别偏好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性别偏好明显的就业市场中，女性毕业生往往需要展示更显著的综合能力优势或获得更高的学历凭证，以部分抵消在就业机会和薪资待遇上的性别劣势。而四级成绩优异或口语流利对升学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使得具备此条件优势的女性毕业生更可能继续深造，以获取更高的教育文凭来提高就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上述影响差异可部分归因于女性毕业生在严峻就业形势下为应对性别歧视所做出的策略性选择。

表 4 英语能力对毕业去向的异质性影响(分性别)

	已落实 (1)	单位就业 (2)	继续深造 (3)	灵活就业 (4)
英语四级证书(基准组：无证)				
有证	0.534*** (0.076)	0.305*** (0.088)	1.461*** (0.133)	-0.403** (0.146)
男性	0.763*** (0.093)	0.859*** (0.102)	0.531** (0.169)	0.382* (0.167)
有证×男性	-0.315** (0.104)	-0.421*** (0.116)	-0.046 (0.177)	-0.014 (0.20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观测数	11254	11254	11254	11254
Pseudo R ²	0.095	0.125	0.125	0.125
四级笔试成绩				
	0.007*** (0.001)	0.003*** (0.001)	0.013*** (0.001)	-0.004** (0.001)
男性	2.004*** (0.316)	1.930*** (0.368)	1.974*** (0.435)	-0.205 (0.683)
四级笔试成绩×男性	-0.003*** (0.001)	-0.003*** (0.001)	-0.003*** (0.001)	0.001 (0.00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观测数	11254	11254	11254	11254
Pseudo R ²	0.106	0.137	0.137	0.137

	续表			
	已落实	单位就业	继续深造	灵活就业
	(1)	(2)	(3)	(4)
英语口语水平(基准组：差)				
一般	0.113	0.247**	−0.046	0.188
	(0.068)	(0.083)	(0.085)	(0.166)
流利	0.417***	0.519***	0.297**	0.415 *
	(0.090)	(0.107)	(0.108)	(0.210)
男性	0.598***	0.717***	0.473***	0.430 *
	(0.086)	(0.101)	(0.107)	(0.206)
一般×男性	−0.101	−0.208	−0.008	0.073
	(0.103)	(0.120)	(0.127)	(0.241)
流利×男性	−0.359**	−0.353 *	−0.351 *	−0.245
	(0.133)	(0.153)	(0.159)	(0.30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观测数	11254	11254	11254	11254
Pseudo R ²	0.093	0.112	0.112	0.112

下面，继续探究不同学科背景毕业生的英语能力对毕业去向影响的异质效应。表 5 第(1)列和第(2)一(4)列分别报告了三项指标影响毕业去向的明确性和方向性的学科差异估计结果。第(1)列中口语水平与学科大类的交互效应估计结果显示，与理工农医专业毕业生相比，口语水平越高，对人文社科专业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的促进作用越明显。在落实单位就业上，有证、笔试成绩或口语水平越高，均能对人文社科专业毕业生的落实率产生更大的提升作用。以上结果支持了假设 H3。

上述结果可能反映了不同学科毕业生所倚重的核心就业能力的不同。已有研究表明，专业技术能力对语言能力有替代作用，且对个体劳动力市场回报率的影响更大(Park, 1999)。理工农医专业的知识与技能通常更具专门化和技术导向，用人单位更倾向于依据毕业生的专业知识、技术能力和实践经验来评估其岗位胜任潜力。相较而言，人文社科专业的技能专门化水平较低，招聘者在评估毕业生的职业胜任力时，更加看重其通用技能的多元性，尤其关注毕业生在沟通交流、团队协作和学习能力上的表现。因此，英语能力凭证或交流能力作为这类通用技能的重要表征，通常被视为人才选聘中的重要加分项，甚至成为某些行业或岗位(如金融、教育和外贸等)准入的“硬技能”。

同时，在中国加速融入并参与重塑全球产业链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事业单位需要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国际视野的人才。突出的英语能力，尤其是口语交流能力，有助于增强人文社科专业毕业生在多种职业环境中的适用性和吸引力，使他们能够胜任更多样化的业务，进而拓宽毕业出路。因此，英语能力在拓展人文社科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平台方面的作用更为突出，对其就业竞争力的提升具有积极的补偿效应。

此外，在落实继续深造层面，第(3)列中人文社科专业与四级证书、笔试成绩的交互项系数均负向显著，说明与人文社科专业毕业生相比，理工农医专业毕业生更可能因其良好的英语基础知识和应试技能而成功升学。相反，英语口语流利与人文社科专业、经济管理专业的交互项系数均正向显著，说明与理工农医专业毕业生相比，人文社科及经济管理专业的毕业生更可能因其出色的口语能力而成功升学。上述影响差异反映了不同学科毕业生在落实继续深造时所倚重的英语能力类型的不同。

表 5 英语能力对毕业去向的异质性影响(分学科门类)

	已落实 (1)	单位就业 (2)	继续深造 (3)	灵活就业 (4)
英语四级证书(基准组：无证)				
有证	0.394*** (0.069)	0.009 (0.076)	1.627*** (0.115)	-0.366* (0.147)
学科门类(基准组：理工农医)				
人文社科	-0.447*** (0.119)	-0.731*** (0.140)	0.152 (0.190)	0.181 (0.202)
经济管理	-0.182 (0.129)	-0.223 (0.139)	-0.597 (0.313)	0.073 (0.227)
人文社科×有证	0.130 (0.132)	0.482** (0.156)	-0.625** (0.202)	0.155 (0.242)
经济管理×有证	-0.165 (0.142)	0.065 (0.154)	0.057 (0.320)	-0.383 (0.27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观测数	11254	11254	11254	11254
Pseudo R ²	0.094	0.124	0.124	0.124
四级笔试成绩	0.005*** (0.001)	0.001* (0.001)	0.013*** (0.001)	-0.003** (0.001)

续表				
	已落实	单位就业	继续深造	灵活就业
	(1)	(2)	(3)	(4)
学科门类(基准组:理工农医)				
人文社科	-0.463	-1.977***	1.544**	-0.595
	(0.385)	(0.457)	(0.511)	(0.772)
经济管理	-0.090	-0.271	-1.011	1.165
	(0.412)	(0.479)	(0.610)	(0.922)
人文社科×四级笔试成绩	0.000	0.003***	-0.004***	0.002
	(0.001)	(0.001)	(0.001)	(0.002)
经济管理×四级笔试成绩	-0.001	0.000	0.001	-0.003
	(0.001)	(0.001)	(0.001)	(0.00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观测数	11254	11254	11254	11254
Pseudo R ²	0.103	0.137	0.137	0.137
英语口语水平(基准组:差)				
一般	-0.028	0.048	-0.138	0.184
	(0.067)	(0.077)	(0.081)	(0.164)
流利	0.117	0.248*	-0.060	0.397
	(0.093)	(0.105)	(0.109)	(0.213)
学科门类(基准组:理工农医)				
人文社科	-0.593***	-0.646***	-0.672***	0.113
	(0.109)	(0.134)	(0.138)	(0.248)
经济管理	-0.418***	-0.256*	-0.715***	-0.109
	(0.114)	(0.130)	(0.153)	(0.272)
人文社科×一般	0.308*	0.309*	0.286	0.204
	(0.128)	(0.156)	(0.161)	(0.285)
人文社科×流利	0.504**	0.607**	0.414*	0.139
	(0.166)	(0.193)	(0.201)	(0.355)
经济管理×一般	0.161	0.160	0.204	-0.123
	(0.133)	(0.151)	(0.177)	(0.319)
经济管理×流利	0.195	-0.046	0.604**	-0.529
	(0.166)	(0.190)	(0.207)	(0.410)

	续表			
	已落实	单位就业	继续深造	灵活就业
	(1)	(2)	(3)	(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观测数	11254	11254	11254	11254
Pseudo R ²	0.092	0.111	0.111	0.111

注：人文社科包括历史学、文学、哲学、教育学、法学、艺术学，理工农医包括理科、工科、农科、医科和交叉学科。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2023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数据，利用多种计量回归分析方法，系统研究了不同维度的英语能力对本科生毕业去向落实率、升学率及就业率的影响，并对上述影响在不同性别和学科背景下的差异进行了探究。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毕业生的英语能力具有显著的人力资本效应和信号效应，能促进其充分落实毕业去向，并影响其去向的选择。具体而言，持有四级证书和四级成绩更出色的毕业生更可能继续深造，期待高学历的信号效应带来更理想的经济回报。若升学失败，这类毕业生更容易陷入“慢就业”，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更低。相较而言，英语口语出色的毕业生，“无业可就”或“有业不就”的概率均更低。他们在落实单位就业上有显著的竞争优势，也更有能力通过各种新形态就业方式落实毕业去向。值得注意的是，英语四级证书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上已出现“贬值”现象，用人单位更依赖于测评得分或实际运用能力来评估其录用资格。

第二，英语能力对毕业去向的影响在不同性别和学科类别毕业生间存在显著异质效应。从性别角度看，英语能力强对女性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升学率及单位就业落实率均产生了更明显的促进作用。从学科类别角度看，与理工农医专业毕业生相比，英语能力强对人文社科专业毕业生落实单位就业产生了更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在性别和学科偏好明显的就业市场中，英语能力能部分削弱这些特征因素带来的不利影响，从效率与公平的角度促进弱势地位毕业生实现充分就业。在落实继续深造上，出色的英语交流能力对人文社科、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帮助更大，而扎实的英语基础和应试技能则更有助于理工农医专业毕业生。这种差异反映出不同学科门类对人才外语技能需求的不同侧重点。

结合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各类本科院校的公共英语教育需加快突破“千校一面”的传统模式,结合区域经济、专业特色和学生需求,开发实用型、特色化的大学英语课程及配套教材,通过创新“第二课堂”、校企合作及跨境项目等方式,创建多元化的语言接触与运用场景,将学生英语知识的积累及时转化为契合实战需求的应用能力,以充分挖掘并发挥公共英语教育在我国外语教育体系中的独特价值。更重要的是,大学英语四、六级测试项目应加快以英语交流和应用能力为导向的考核机制改革,通过提升对学生语用能力评价的信效度,增强其在就业市场中的信号价值,并发挥“指挥棒”效应,推动公共英语教学从“理论”向“实用”、从“应试”向“应用”的务实转变。

其次,大学生应根据个人的基本特征、学科专业特色、未来发展方向及目标行业需求,制定个性化的英语学习策略,有针对性地提升某一(些)维度的英语能力。例如,有就业意向的本科生需重视口语能力的提升,因为“能说”在契合职场需求方面更具竞争优势;有志于继续深造的本科生需着力强化英语基础知识与应试技能,而人文社科方向的申请者还需格外重视口语能力;女性本科生需加大英语学习投入,因为优质的语言资本和能力被证明有助于缓解就业歧视,促进机会公平。

最后,为提升英语学习与市场需求的适配度,大学生应结合实际,理性投资英语技能,避免过度教育带来的高信号成本。大学生需立足“以用为先”的理念,通过高频语言接触、实质性运用与有效互动,切实提升跨文化交流和职场应用能力(刘星滢,2018);同时,践行终身学习理念,持续拓宽“英语+”能力边界,以适应新技术、新职业、新业态的挑战,实现英语投入的最大回报。

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尽管本文已从多个方面对毕业生特征进行了控制,但仍可能存在同时影响毕业生英语能力和毕业去向的不可观测变量,进而可能带来遗漏变量引起的内生性问题,这有待在未来使用更详尽的高校毕业生调查数据进行完善。

[参考文献]

- 罗德·埃利斯,2020:《第二语言习得概论》,牛疏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陈琳,2014:《语言学习中的性别差异:表现、原因与思考》,《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3期。
- 董占奎,2014:《工作搜寻行为影响因素实验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高原,2017:《中国城镇居民语言能力回报率实证研究——普通话与英语能力回报率的对

- 比分析》，《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第1期。
- 贺尊，2006：《高等教育文凭信号的经济学解析》，《比较教育研究》第4期。
- 霍灵光、陈媛媛，2017：《英语技能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溢价测算》，《南方经济》第12期。
- 江桂英，2010：《中国英语教育：语言经济学的视角》，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 贾巍巍，2021：《英语能力与高校本科生毕业去向差异的实证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金艳、杨惠中，2018：《走中国特色的语言测试道路：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三十年的启示》，《外语界》第2期。
- 刘国辉，2013：《中国的外语教育：基于语言能力回报率的实证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刘国辉、张卫国，2015：《中国城镇居民英语能力的经济回报率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 刘蓝惠、周蕾，2018：《考证对大学毕业生初次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以南京农业大学管理类专业为例》，《中国农业教育》第5期。
- 刘凌云、杨钊、刘鑫桥、蒋凯，2018：《英语能力对大学毕业生工资收入影响研究——来自CEPS的证据》，《教育发展研究》第21期。
- 刘星滢，2018：《英语技能的人力资本效应与信号效应：来自筛选假设的解释》，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潘昆峰、崔盛，2016：《语言能力与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溢价》，《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2期。
- 邱文琪、岳昌君，2024：《核心能力对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和就业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中国青年社会科学》第2期。
- 邱文琪、岳昌君、闫思宇、管雨婷，2024：《202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实证研究——基于单位就业与灵活就业的对比分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2期。
- 谭远发、王恬、周云，2017：《英语听说能力对就业性别差异的影响——来自CGSS2013的经验证据》，《财经科学》第10期。
- 熊毅，2016：《外语学习能力与高校毕业生收入的经济效应分析》，《当代职业教育》第8期。
- 许其潮，1999：《从语言经济学角度看我国的外语教育》，《外语与外语教育》第8期。
- 岳昌君，2012：《我国阶梯型劳动力市场中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结构与对策》，《中国高等教育》第6期。
- 岳昌君，2013：《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2期。
- 岳昌君，2023：《高校毕业生就业观念：特点、变化与差异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第5期。
- 张卫国，2008：《作为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语言：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框

- 架》，《经济研究》第 2 期。
- 张忻，2008：《语言的经济学与大学英语教育》，《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 周丽萍、蒋承，2020：《拼证能否提薪？——通用型证书的收入效应和信号发送机制研究》，《教育与经济》第 1 期。
- Akresh, I. R. and R. Frank, 2011, “At the Intersection of Self and Other: English Language Ability and Immigrant Labor Market Outcom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0(5): 1362—1370.
- Breton, A. , 1964, “Economics of Nationalis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2(4): 376—386.
- Chiswick, B. R. , 1978, “The Effect of Americanization on the Earnings of Foreign-Born Me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6(5): 334—359.
- Chiswick, B. R. , 1991, “Speaking, Reading, and Earning among Low-Skilled Immigrant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9(2): 149—170.
- Chiswick, B. R. and P. W. Miller, 1995, “The Endogeneity between Language and Earnings: International Analyse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3(2): 246—288.
- Chomsky, N. , 1965,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Di Paolo, A. and A. Tansel, 2019, “English Skills, Labour Market Status and Earnings of Turkish Women”, *Empirica*, 46(4): 669—690.
- Gardner, H. , 1983, *Frames of Mi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Guo, Q. and W. Sun, 2014, “Economic Returns to English Proficiency for College Graduates in Chinese Mainland”, *China Economic Review*, 30(C): 290—300.
- McManus, W. , W. Gould and F. Welch, 1983, “Earnings of Hispanic Men: The Role of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2): 101—130.
- Park, J. H. , 1999, “The Earnings of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Effect of English-Speaking A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 Sociology*, 58(1): 43—56.
- Spence, M. , 1973, “Job Marketing Signal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7(3): 355—374.
- Svantesson, E. , 2006, “Determinants of Immigrants’ Early Labor Market Integration”, Working Paper, No. 2,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Örebro University.
- Tong, F. , X. Na, Z. Jane and J. Hartley, 2022, “Employer Attitudes and the Hiring of Immigrants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anadian Public Policy*, 48(S1): 17—37.
- Wang, H. , R. Smyth and Z. Cheng, 2017, “The Economic Returns to Proficiency in English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43(2): 91—104.

The Influence of English Proficiency on Graduation Destinations among Undergraduate Graduat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2023 Data from Chinese College Graduates Employment Survey

RUAN Qian¹, YUE Chang-jun², YAN Si-yu³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cing & Law Enforcement,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2. Institute of Economics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3.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educational shift towards multilingualism, public English education faces dual demands of value reassessment and quality enhancement. Meanwhile, improving employability to align higher education with market needs is a crucial direction for the current reform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talent education. Based on the 2023 data from Chinese College Graduates Employment Surve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English proficiency on undergraduate graduates' furthe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aduation destinations, providing empirical evidence and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optimizing university English teaching and alleviating employment pressure. The findings show that English proficiency significantly facilitates undergraduate graduation destinations and influences their choices. Students with higher CET-4 scores or certificates are more likely to pursue further education, less likely to engage in flexible employment, and more prone to "slow employment". In contrast, those with higher oral proficiency are more inclined towards organizational employment, have a higher likelihood of flexible employment, and a lower probability of "slow employment". In promoting organizational employment, the signaling effect of the CET-4 certificate weakens, while the positive impacts of CET-4 scores and oral proficiency remain significant. Moreover, strong English proficiency is particularly beneficial for female and humanities/social science graduates, helping to narrow gender and disciplinary gaps in employment and promote equal opportunitie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public English education is valuable for serving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undergraduates, but needs to accelerate the shift from a test-oriented to an application-oriented teaching model. The undergraduates should optimize their English learning behaviors based on personal development needs and strategically leverage their English advantages to better serve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Key words: undergraduate graduates; English proficiency; graduation destinations; public English education

(责任编辑: 孟大虎 责任校对: 孟大虎 刘泽云)